

# 略论明代士人的疆域观

## ——以章潢《图书编》为主要依据

安介生 穆俊

一个时代疆域观的形成,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明代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故而其疆域认知问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明代留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浩繁,其中章潢所辑《图书编》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明代重要历史地理学著作,保存了大量明代士人对当时疆域认知与理解的资料。作者首先较为系统地归纳并评价了明代士人疆域观的一些主要特点,进而深入分析明代士人疆域观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认为明代疆域观的形成,与中国历代王朝建设之经验、明代君主之主导、知识群体的政治思想,以及对边疆地区的地理认知等因素直接相关,并强调历代疆域观的研究理应为当代领土(疆域)研究、边疆研究以及国防教育的宝贵借鉴。

关键词 明代士人 疆域观 章潢 《图书编》

作者安介生,1966年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穆俊,1983年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邮编200433。

### 一、引言

所谓“疆域观”,其内涵是相当广泛与复杂的。通常而言,“疆域观”不仅指人们对于当时国家整体或局部的疆域建设与疆域变迁状况的认知、理解及评价,也包括对于疆域维护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的应对之策。古文献中出现的“疆域”的内涵,与今天的所谓“疆域”专指国家疆域的情形有所不同,往往既指一个政权与王朝的疆界及国土范围,也可泛指任何区域的外在界限之内的辖域范围。疆域观不仅存在时代性的差异,而且就一个时代而言,疆域观也存在群体性或阶层性的差异,但在总体上有着更多的共性与相同特征,而其核心应该是官方对于当时疆域范围的权威认定,即研究者所称“国家疆域观”。<sup>①</sup>

一个时代疆域观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明代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故而其疆域认知问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重要性表现在:其一,这一时期关于疆域

<sup>①</sup> 据笔者检索,迄今为止关于明代疆域观问题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栾凡:《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韩蕾蕾:《明代陆地边疆治边方略的论争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以及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

问题的冲突与矛盾极为突出,其复杂性与艰巨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其二,明代在疆域建设与维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可低估。其三,尽管明代的疆域规模与今天中国的疆域现状有着较大差异,然而,对于当时疆域观的研究依然有着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其四,一个时代的疆域观念与疆域建设之间有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疆域建设状况,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其疆域观念形成的缘由;反之,不了解疆域观念的真正内涵,我们也无法全面认知其疆域建设的时代特征与局限性。其五,一个时代的疆域观不可能是孤立的,而与国防观、民族观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影响。总体而言,疆域观既有历史变迁的印记,更是现实疆域关切的写照。

明代留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浩繁,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而充实的条件。其中章潢<sup>①</sup>所辑《图书编》是一部明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历史地理学著作。全书共127卷,其中第29卷至67卷为“地道”类,涉及丰富的疆域变迁内容,其学术价值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sup>②</sup>正如评论者所云:“《图书编》引据古今,详赅本末,虽儒生之见持论,或涉迂拘,然采摭繁富,条理分明,浩博之中,取其精粹;于博物之资,经世之用,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sup>③</sup>本文即主要通过分析章潢《图书编》的核心观点,参照其他明代士人的著作、文章,对明代士人的疆域观及其相关问题的认知状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研讨。

## 二、明代士人疆域观之评析

明代士人疆域观的形成与变化,与明朝疆域变迁的历程直接相关。有明一代,在疆域的建设与维护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疆域的冲突与争夺,成为明王朝政治历程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疆域问题或疆域危机贯穿明朝始终。与此相呼应,明代士人的疆域观也呈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点。

首先,明朝士人的边境及疆域意识已相当强烈,为形成较为全面而稳定的疆域认知观念奠定了基础。其表现之一便是,在当时文献中关于“疆域”、“疆理”、“疆土”、“疆界”、“疆场”、“边疆”、“边境”、“边界”、“边务”等相关问题的奏疏与讨论文章相当繁多,显示出当时士大夫阶层对这些问题的敏感与思虑。如白圭在《覆万翼安边疏》中指出:“故事:边境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sup>④</sup>这说明明朝承继了以往的惯例,同样建立了相当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又如陆燾在《处置边防疏(筑边墙)》中强调指出:“臣闻设险守国,经世之要务;有备无患,保邦之远图。古之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沟池为固,其在边疆所系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sup>⑤</sup>

<sup>①</sup> 章潢,字本清,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人,生于嘉靖六年(1527),卒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其学识渊博,在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明代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构洗堂于东湖,聚徒讲学,聘主白鹿洞书院”,被称为“江右四君子”之一。参见(明)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卷24《征君章本清先生潢》(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明史》卷283《儒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同)。

<sup>②</sup> 参见辛德勇撰《章潢》一文,谭其骧主编:《历代地理学家评传》(三),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sup>③</sup>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3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④</sup> 《明经世文编》卷42《白恭敏奏疏》,明崇祯平露堂刻本,下同。

<sup>⑤</sup> 《明经世文编》卷289《陆贞山集疏》。

又如丘濬在《守边议》中指出：“至于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徭径，则专为边境言焉。然边境之中，亦其城郭，而其城郭也，则有门闾焉，门闾之或启或闭，则有键闭管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阙簿，使之坚而厚，而又戒其门禁之出入，于键闭管钥也，则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sup>①</sup>章潢对明朝疆域的构成特征则有着更为宏观的认知与把握：

概而论之，地理疆域其可以弗究乎……吾以是益知九边要害。譬大家门户，利在关防。设使大门不严而守仪门，角门不固而守房门，可使暴客不入吾院宇及吾房舍乎？今宣府、大同，国朝大门也；辽东、延、夏、甘、凉，角门也；山海、居庸、紫荆、雁门之类，仪门也。缓大门而急仪门，不可以言计；无故而退守，不可以言武；纵大门失守，独责仪门，不可以言法。深谋远虑者，可不加之意哉？<sup>②</sup>

笔者以为：这种宏阔而精致的疆域地理观念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这种观念立足于全面而准确地了解边疆地区自然地理特征与战略地位。章潢本人精于“形势论”，这一特点在其疆域观中也显露无遗。

其次，就整体而言，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明代士人对于明朝疆域建设的成就充满了自豪，虽然其中不乏对天朝大国歌功颂德、自我夸饰的色彩与成分，但是，总体而言，各位士人的论述，并不可能是纯粹的“空穴来风”与“无根之谈”，明朝边政建设的成就需要肯定。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等历代皇帝关注国防，花大力气着手构建了相当严密的、全国一体的疆域防御体系，这种努力与成果受到了不少明朝士人的高度评价。因此，在很多明朝士人的论列中，边防防御体系，即国防观，是与疆域观关系最为密切的、谈论最多的内容。明代的边防体系，可以概括为：北有九边诸镇，南有万里海防。如章潢在《天下各镇各边总说》一文中较全面地勾勒出当时国防体系的地理结构：

我高皇帝克定前元，统一寰宇，经邦画野，设官分职，居中制外，小大相维，奚啻众星拱北辰哉？！即于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建立四镇，后于蓟州、甘肃、宁夏，分布三镇。列圣相承，又以山西巡抚统三关，陕西巡抚统固原，共为九边。然又合蓟、辽，合宣、大，合宁、固、庄、肃，为三大总督。沿边屯聚兵马，修筑墙堡，设立烽堠，所以防北边者，亦何备哉！他如云南、两广、南赣、郟阳，各设督府。两直隶十三省，各设都司；万全、东昌等处，各设行都司。或于各郡邑、险隘所在，各设卫所，并设兵备以统辖之。要皆因其地方要害、轻重。故屯兵多寡，以抗其吭而抚其背耳。若夫沿海自琼州以达辽东，又各设卫所，以扼其岛屿，所以备南倭也。近于浙直，亦建督府以总海防。惟淮扬总府虽专司河漕，而岁集运军数万，亦以豫为临清、江淮之防焉。此其建置，扼险据要，棋布星列，如臂指相使，枝干相承，

<sup>①</sup> 《明经世文编》卷73《丘文庄公全集》。

<sup>②</sup> 《图书编》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可谓极周密矣!①

又如在疆域面积方面,明朝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周叙在《复仇疏》中所云:“堂堂天朝,疆域万里,兵甲数百万。”②

在一些明朝士人看来,在西南及西北等部分边疆地区,明朝疆域范围甚至远胜汉、唐两朝,如云:“我太祖抚有滇南、贵州诸夷,施亦服属,既我成祖复郡县,其地任土作贡,服徭役与诸甸服同,其大一统之盛,远过三代,何汉、唐足云乎?”③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又如马文升在《为预防边患以保重地事疏》中指出:“甘、凉地方,诚为西北之重地也,汉、唐之末,终不能守,而赵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复入职方,设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谋远虑,首命内臣总兵,以镇守其地,边境晏然,无事干戈。”④章潢本人尤其对朱元璋与朱棣两位皇帝在边疆开拓上取得的成就推崇备至:

我太祖诞膺宝命,振天维而总坤络。既奠基江左,表率万方,一六合而光宅,乃经营四方。东北起辽海,西尽张掖,以要会为镇,咸建强宗。东南命东瓯,环海置戍;西南委黔宁,永绥滇服。东收朝鲜,为守礼之藩。盖开济维新,而万叶之鸿谟大定,兼乎保业矣。成祖法天枢以定鼎,溢天下之吭而捭其背,亲御六飞,三犁边庭,至视斗杓而还,于挾伐不靖,时联络诸塞,势如控御,靡不顺从。封哈密以控诸蕃,定交趾,复汉唐故壤,西南建官府,以慰抚称者。牙错而居,使臣航海,重译而款三十六国。盖纂绍重光而堂构之,固特劳兼乎创造矣。皇朝舆图之广,际天匝地,书文通被,几将日所出入,神农所称,禹迹所被,曷以侈兹?!⑤

其三,较之前朝,明代疆域维护与国防形势的任务更为艰巨,其过程可谓艰苦卓绝,士人阶层对疆域安危充满了忧患意识。就具体方位而言,明朝的边防形势可谓四面受敌,疆域安全受到全方位的威胁。北有蒙古,南有交趾,东有倭寇,西有哈密与土鲁番。因此,明朝士人的疆域观始终与疆域安全相联系,始终与边防建设相联系。如商辂在《边务疏》中指出:“方今急务,守边为上,守关次之。若徒守京城,此为下策,何也?若边方失守,则关隘紧急;关隘失守,则腹里人民望风流移,人心摇动,变故百端。纵有京师军马,强寇在远,亦何所施……”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明代国防体制的基本格局,即存在边方—关隘—腹里三个层级,边疆地区自然是重中之重,首当其冲。又如大明王朝诞生于与蒙元政权的争夺与对抗之中。这种争夺与对抗,最终演变为南北疆域的争夺与抗衡。为此,明朝建设了宏大的边境防御工程——“九边”。即便如

① 《图书编》卷43《天下各镇各边总说》。

② 《明经世文编》卷25《周学士奏疏》。

③ 《图书编》卷48《贵州夷总论》。

④ 《明经世文编》卷63《马端肃公奏疏》。

⑤ 《图书编》卷34《古今方輿总论》。

⑥ 《商文毅疏稿》,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 塞外蒙古骑兵的频繁侵袭 ,依然是明朝边防的最严峻的威胁。章潢对于北疆安危十分担忧:“或有问于论者曰 ‘今天下之患何居?’ 论曰 ‘北边最可忧 ,余无患焉。’ 曰 ‘何以为可忧也?’ 曰 ‘我太祖皇帝迅扫之后 ,百余年来 ,生聚既蕃 ,侵噬渐近。开平、兴和、东胜、河套之地 ,皆为所据。额森和硕之后 ,益轻中国 ,恃其长技 ,往往深入。风雨飘忽 ,动辄数万。我军御之不过 ,依险结营 ,以防冲突 ,仅能不乱 ,即为万全 ,视彼驱掠 ,莫敢谁何……’ ”<sup>①</sup>可见 ,塞外蒙古骑兵势不可挡的兵威 ,给中原士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杨一清在《一为乞留方面贤能官员共济时艰事》一文中特别强调陕西在明代边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照得陕西地方 ,乃边境之枢衡 ,中原之锁钥。北有河套之敌 ,警报无时; 西有回贼之寇 ,奸谋罔测……”<sup>②</sup>又如“照得陕西八府所属州县 ,皆地临边境 ,烽火兵戈之虞 ,沙塞苦寒之惨 ,故选斯地者多不乐为 ,见任官员多复求去 ,其勉强在任 ,勤敏可托者 ,十无二三; 庸猥不堪者 ,十常八九 ,势使然也。”<sup>③</sup>明代的“陕西”(即陕西布政使司及陕西行都司)地域广大 ,包括今天陕西、甘肃、宁夏等地 ,边防任务极其繁重。关于西北地区的疆域维护问题 ,章潢曾经特别强调河套地区的重要价值 ,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洪武之初 ,西北边防重镇 ,曰宣府 ,曰大同 ,曰甘肃 ,曰辽东 ,曰大宁。永乐初 ,革去大宁 ,惟存四镇。宁夏守镇 ,肇于永乐之初; 榆林控制 ,始于正统之世。其余花马池等堡 ,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处置 ,固已严密 ,但所谓黄河套者 ,尚若阙焉。何也? 前代所以废弃之者 ,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 ,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 ,顾有在河套之外者 ,秋高马肥 ,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 ,屯结其中 ,以为内地之扰。幸其素无深谋 ,忽往忽来 ,有获即去 ,似若无足为意者。然患贵乎先防……”<sup>④</sup>章潢的眼光是相当锐利的 ,蒙古部落占据河套后 ,对西北边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蒙古部落)掳中国人为向导 ,抄掠延绥无虚时 ,而边事以棘。”<sup>⑤</sup>

根据外来威胁的不同 ,明代士人对于不同方位的边疆重要性评估与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南北相较 ,明人认为北疆防守重于南疆 ,但南疆防守更急于北疆:“今天下言防御之略者 ,北固重而尤必急于南也。”<sup>⑥</sup>这种评估显示出明代对于疆域问题认知的复杂性。可以说 ,南北边疆都非常重要 ,难分伯仲。明朝首都北京位于北方 ,距离长城边塞较近 ,因此 ,这种区位特点决定了北边之重要地位。“我朝之都燕也 ,盖与古不同 ,稍北于周、汉 ,而大胜于东汉、赵宋矣。”<sup>⑦</sup>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 ,北京坐北朝南 ,控驭南面腹地 ,九边则为京师的后防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京师天下根本 ,论天下形胜 ,当推本京师……虽宣、大、蓟、辽、保定 ,俱为近辅 ,宣、大最急 ,尚为外蔽 ,而蓟镇独处京师之背 ,其关系不尤重乎?”<sup>⑧</sup>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明人对于西

① 《图书编》卷 43《九边总论》。

② 《关中奏议》卷 12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关中奏议》卷 17《一为举用边方官员事》。

④ 《图书编》卷 43《边防考》。

⑤ 《明史》卷 327《鞑靼传》。

⑥ 《图书编》卷 49《广东总镇图叙》。

⑦ 《图书编》卷 43《边防形胜》。

⑧ 《图书编》卷 44《蓟州总叙》。

北陆疆的防御十分重视,但是,对于东部海疆则以一种较为中庸平和的态度对待,对于来自滨海邻国的祸患,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如朱元璋指出:“朕以诸小蛮夷阻越山海,不侵中国,无烦用兵,惟西北最强,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卿等记此言知朕意。”<sup>①</sup>朱元璋又曾在诏书中借用隋炀帝征伐琉球的例子,来告诫群臣:“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变之源。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荼毒生民,徒慕虚名,反疲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sup>②</sup>应该说,这些言论,对于明代士人疆域观的形成具有十分直接的影响。

其四,明代的疆域维护与外来威胁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在不同时期的外来威胁有所不同,疆域争端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时空差异。而前朝疆域维护中的失误及失败之处,为明代学者们每每提及,并引发深刻反思,故而对于疆域政策与疆域认知的影响十分突出。章潢曾经相当沉痛地总结道:“又国家边防之制,西起甘肃以跨宁延,连亘宣大,东尽辽海。而又于甘肃之西,封哈密以制西域;大同之西,表东胜以控河套;辽阳之西,辟大宁以遏山戎。国初之规画备矣。自乌梁海以义从而割大宁,则畿辅之屏蔽始撤。东胜以广漠失备,而北门之锁钥始疏。哈密以土番侵据,西域之藩篱始剖。暨乎大同之大边既失,而内边之内弃为王庭,则门庭之寇深矣。西番之求援甚切,而边方之臣置而不应,则肘腋之患生矣。此其失也,失地险也。”<sup>③</sup>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哈密(今新疆哈密)均是明代早期具有标志性的边境要地,此三地之丧失,大大削弱了明朝对河套、东北及西北边地的防御能力,可谓明朝疆域防御过程中的重大失误。

明代南方疆域的争夺聚焦于交趾问题。明朝初年,今天的越南境内存在两个国家,北部为安南,中部为占城。起初,安南和占城均与明朝保持着遣使朝贡的关系。而为了得到明朝的支持,即位的安南国王经常请求明王朝的册封。但是,随着安南国力的增强,安南一方面与明朝广西土司发生领地冲突,另一方面试图攻灭占城国,于是明朝与安南的关系陷入了僵持的阶段。永乐年间,明朝军队大举南征安南,一度将安南归入明朝疆域之内,设置郡县。但是,安南境内反叛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停息,变乱丛生,明朝又数次派出军队镇压,然而矛盾愈发复杂纠结。故自宣德初年,明朝撤回了官员与守军,安南恢复独立建国,但是,明朝与安南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因此平息。基于这种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明朝士人对于安南的态度也显得十分复杂与矛盾。章潢在《图书编》中重点引述了丘濬的观点,沉痛地指出:“呜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与南海、广东、桂林同入中国。汉武帝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人相颉颃矣。奈何世亘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于要荒之域,而为侏?蓝缕之俗,一何不幸哉!”然而,章潢又不得不承认现实:“莫氏之于安南,亦由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卫固矣。征之则失春秋‘详内略外’之体,因而与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吾故曰:征之,不若弃绝之为得策也。”<sup>④</sup>可见,章潢十分清楚地知道交趾曾经归属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但是,

① 《图书编》卷50《制御四夷典故》。

② 《图书编》卷50《制御四夷典故》。

③ 《图书编》卷43《北部墩塞制御由我议》。

④ 章潢:《图书编》卷51《安南总论》。

他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莫氏政权深得民心,已成为安南国难以撼动的主宰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擅起兵端,兴兵征伐,必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 三、明代士人疆域观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分析

一个时代疆域观念的形成,有着相当复杂而客观的过程,不仅有历史文化经验的影响,而且受到这个时期与疆域发展相关的地缘政治关系、人文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综而观之,影响明代士人疆域观的主要因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历史疆域认知之传承

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崇尚祖先,“以古为尚”。章潢明确强调历代王朝疆域的承袭关系:“天下舆地,古今一也。其在古也,诸侯之封土不一;其在今也,畿省之郡县不齐。”<sup>①</sup>同时,历史时期强盛的王朝的疆域规模,往往成为后世人们评价所处王朝成就的最主要依据与标尺之一。明朝士大夫也习惯于将本朝疆域规模与前朝相比较,如丘濬在《边防议(复河套)》中指出:“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跋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金、元以夷乱夏,无有所谓边者。我圣祖得天下于中国,盖当夷狄极衰之际,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sup>②</sup>这种评价是相当公允的。章潢也曾指出:“学士大夫尝言我朝疆域,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盖以朔方、大宁、交趾,及开平、兴和、玄菟、乐浪、炖(敦)煌不足故也。”<sup>③</sup>可以说,这种比较的观点在明朝知识界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又如明人力主收复河套,便主要是出于历史继承的观念。河套自古就地处“夷夏”分界之地,明代前期曾占据其地。“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国所守以界夷夏,又我圣祖之所留也,一统故疆,三边沃壤,其理宜复”。<sup>④</sup>另一方面,河套地区在明朝北方防御系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若距榆林以为边,则河套永弃,边患何时而息乎?”<sup>⑤</sup>因此,对于失去河套地区,明人普遍感到极为痛心,难以接受。章潢曾郑重提出“复河套议”,强调河套之地是“祖宗之疆理”,<sup>⑥</sup>并反复呼吁:“呜呼!唐张仁愿犹能筑三受降城于北,以绝敌南寇路,而我朝不能因河为固,以守河南,而使敌得入据以游牧,以为关陕无穷之害,我朝将有愧前代矣。”<sup>⑦</sup>显然,历史责任感,事实上成为明代士人考量边疆问题时不能回避的驱动因素之一。

① 《图书编》卷34《舆地总论》。  
 ② 《明经世文编》卷73《丘文庄公全集》。  
 ③ 《图书编》卷34《皇明舆图四极》。  
 ④ 《图书编》卷46《曾总督复河套疏》。  
 ⑤ 《图书编》卷46《曾总督复河套疏》。  
 ⑥ 参见《图书编》卷46《复河套议》。  
 ⑦ 《图书编》卷46《河套事宜》。

明朝中后期,西方地理学思想的输入,对于中国士人世界观与地理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将西方中世纪地理学传入中国,要归功于利玛窦等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例如利玛窦于1582年进入中国内地,那时,章潢已有55岁,利玛窦去世于1610年,而此时,章潢去世仅两年。可以说,章潢与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等耶稣会传教士是同时代之人,这些传教士均有天文、地理等著作行世。我们惊奇地看到,章潢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地理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地球说”,《图书编》中有“地球图说”,绘制有《舆地山海全图》与《舆地图》,上面明确标示出“赤道”、“北极”、“南极”等地理名词。他还解释道:“地与海本圆形,而全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讲,章潢可谓传统时期最早的一批初步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士人之一。但是,遗憾的是,因为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整体地理认知的匮乏,章潢依然习惯以先秦时期形成的所谓“四海”的观念来统论周边形势,固执地以“夷”来称呼中国境内非汉民族及境外民族,并绘有《四海华夷总图》,无法从传统“夷夏”观念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如云:“……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惟西与北尚未底于海耳!然视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绝漠之险,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居之处,其有与无,固不足为重轻也。”<sup>②</sup>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章潢滞后的民族观、地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与决定了他的疆域观。

## (二) “慎战谨备”与“祥和博爱”之主导思想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早就对边疆问题立下训示,即“祖训”,主旨在于告诫后世子孙不可轻易以开疆拓土为由而发起战争,以“无故兴兵”为不祥,这种思想在明朝士人中影响深远。章潢《图书编》便将“皇明祖训”列在了“制御四夷典故”之首。“皇明祖训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赋,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土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吾恐后世子孙,以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慎勿为也。但诸部在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sup>③</sup>“皇明祖训”虽然以王朝自身利益作为考量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其中包含了爱惜百姓生命、倡导和平的积极内容,为后世朝野士大夫所普遍接受。如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指出:“窃惟今日疆域,远过有宋,并于唐,而不及汉者,以失岭外此三郡(即九真、日南、交趾)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训,而不愆不忘,此继述之大孝,守成之大体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sup>④</sup>又如王家屏在《答蔡龙旻年丈(田州疆土)》一文中提出:“拓疆易,守疆难,守疆而无后患尤难。”<sup>⑤</sup>类似认识相当深刻,在明朝士人中带有普遍意义。

章潢本人则更是将博爱思想贯彻于其疆域观中,表达出较为强烈的反战思想:“至于后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徕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虽外国,亦犹中国之民也,趋利避害,欲生恶死,岂有异于人乎?王者于天地之间,无不养也。鸟兽草木,犹当爱之,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残其民乎?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

① 《图书编》卷29《地球图说》。

② 《图书编》卷34《皇明舆图四极》。

③ 《图书编》卷50《制御四夷典故》。

④ 转引自《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811册,四部丛刊本。

⑤ 《明经世文编》卷393《王文端公文集》。

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其失不在于己,必在于子孙。故有征讨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中国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自治,修其礼乐刑政以惠养吾民,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革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sup>①</sup>章潢之分析与总结,以倡导博爱、维护和平为主旨,是对“皇明祖训”更为全面的解读与发展,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 (三) 现实疆域建设之困境

古人与今人所处环境毕竟存在巨大的差异,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即使在一个王朝不同时期,自身国力的强弱、敌对势力的消长,都会对疆域维护与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承认现实的困难与无奈,往往成为后代人们的最终选择。如除安南问题外,西北地区的边防问题也十分棘手,令章潢颇感无奈:“夫古称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舆,什得五六耳……国初置内属番夷,为罕都、察逊、安定、鄂端等卫,北连哈密,南隔诸羌,河首盐池,大称藩翰。自正德四年,额布勒以获罪酋长逃遁而西,乞地内附。我仓卒无以为应,遂溃边,掠内地,入西海,破安定等卫,诸番散亡,因据其地,南牧之渐,此实厉阶。当时经略诸臣,如彭泽、金献民、杨一清、王宪、王琼、赵载、唐龙等,为剿为抚,不遗余画,然竟不得其要领……”<sup>②</sup>一时之失策,竟造成日后难以挽回的困境,难怪乎章潢会反复提及河套问题,难以释怀。

### (四) 空间距离、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之阻碍

疆域开拓与维护,并非只是不同政治势力角力与博弈的简单结果,其过程实际上受到空间距离、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交通状况等客观因素的直接影响。在社会生产力与政治空间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古代,这种影响往往会显得更为突出。政治建设中的空间距离,主要是指边疆与政治中心区之间的距离。所谓“天高皇帝远”,正是指这种影响因素。当时最典型的区域莫过于云贵、两广及交趾地区等。“若滇则孤悬万里,恃中国以为声援,其地辽阔广远,实东则西虚,南顾则北单,不患无地,而患无人以守。外有窥伺之虞,而内有负固之渐。如秦之函谷,蜀之剑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非如中州之四通八达,一号召之间,士马云集,无仰哺待救之难也。”<sup>③</sup>自然环境之恶劣,有时极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的生存与生活,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让当时的人们畏难而退,进而使疆域建设出现空白之地。其影响是直接的,这在岭南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夫两广,极南地也。故其气候常多暑少寒。少寒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间作。梧以西则渐甚。盖由山势局促,层峦迭嶂,茂林深箐,居人如坐甑中。热郁薰蒸,故瘴疠作焉。炎荒之地,大抵然也。”<sup>④</sup>不得不承认,这种困境是客观的,并非主观意愿所能轻易改变。

考虑到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残酷的战争创伤,章潢对于明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军事征伐行动表达了极力反对:“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苗僚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人梗化,则如(刘)晏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烦一戟,而威德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千万之师,毋

① 《图书编》卷50《东夷总论》。

② 《图书编》卷47《西事画余》。

③ 《图书编》卷42《入滇之路》。

④ 《图书编》卷49《两广总图》。

使中国之民,惧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之境,如晏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sup>①</sup>章潢的观点以民为本,爱惜百姓生命,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看到,明朝在南方地区的一些军事征伐也并非全部是好大喜功所致,不少边地事件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广泛的影响,显然难以如汉朝大臣陆贾安抚南越那样轻易平定。

#### 四、结 语

疆域认知与疆域观不仅是传统时代地理认知发展的一部分,也是王朝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前朝学者的认知与观点,成为有“崇古”倾向的后朝士人最主要的观念渊源。这在疆域观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在章潢所编撰的《图书编》中,历史的回溯与历史地理的探讨内容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章潢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创造”,同样是参考与总结了明朝其他前辈或同辈学者的意见,如丘濬等人的认识对章潢影响很大。当然,历史积淀的深厚,也为后世学者的选择提供了较大空间。虽然难以避免“书生论政”与“事后诸葛亮”的不足与偏颇,但明朝士人的论著依然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边疆政治与地理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疆域观与国防观一体,为明代士人边疆史地思想的一大特点。明朝所建立的庞大的边防体系,对于明朝的疆域维护居功至伟;而这种边防建设,对于增强普通士人边防意识与疆域观念具有十分直观的影响。

一个时代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实为十分积极的互动关系。社会理念源自社会现实,不会为空穴来风,而社会理念形成之后又会直接影响现实行动。社会理念相对滞后的问题,在明朝士人疆域观中也得到了证明。以章潢所论为例,尽管已有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但其疆域观并没有出现跨越性的飞跃,可以说,疆域观作为其社会理念的一部分,在社会总体世界观与民族观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前,其疆域观的调整与改进是相当有限的。一方面,明朝士人对于边疆地区通常缺乏实地调查,始终难以摆脱传统“夷夏”民族观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及交通条件的限制,明朝士人对边远地区采取较为漠视或可有可无的态度,非常显著地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疆以世殊,名以时易。”<sup>②</sup>中国历史时期的疆域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地域上的划界分疆的问题,而且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文化表征与地理认知进展。中国历代王朝疆域之变迁极为复杂,与之相关的文化心态、地理环境的认知等问题同样极为曲折复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分析与研究传统时代的疆域观念与疆域思想,对于今天疆域理论与思想的形成及完善也是至关重要的。历代疆域观,与当时的国防建设、对边疆地区的认知与管理以及疆域维护系统直接相关,理应成为当代领土(疆域)研究、边疆研究以及国防教育的宝贵借鉴。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sup>①</sup> 《图书编》卷34《百粤总论》。

<sup>②</sup> 《图书编》卷34《舆地总论》。

# CONTENTS

## THEORY OF BORDERLAND STUDIES

### **From Feudal Estates( 邑土) to Territory——Change of the Borderland in Pre – Qin Period ..... Bi Aonan( 1 )**

A country based on feudal estates centered on Duyi( 都邑) and was based on Shuyi( 属邑) . The frontier in narrow sense of Shang Dynasty meant the whole territory of Wangji( 王畿) and the generalized frontier consisted of tributary states ruled by the king of Shang in Situ( 四土) areas. Shang took within and without Fu ( 内外服) system and the indirect ruling way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leaders' obedience and tribute to the king. The dominion of kingdom Zhou was constituted by Wangji and princedoms. The princedoms were actually the frontiers of powerful kingdom Zhou while the lands and the people distributed by the king of Zhou. When Zhou was falling down , the king was reduced to a nominal mutual – emperor and the marginal Yi and Bi where Sui men ( 遂人) lived in the suburbs became the borderline.

**Key words:** pre – Qin period feudal estates territory

### **The Conflicting and Blending of the Border Concept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Analysis of the Border Concepts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 Vietnam ,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 Sun Hongnian(12)**

In Qing Dynasty , two kinds of border concepts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in China , Vietnam , Korea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when they faced with border problems and territory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border concept in culture , which referred to the recognition of belonging or not , ie , the traditional Yi and Xia's Distinction( 夷夏之辨) ; the geographic boundary concept , which was reality cognition to territory , boundaries etc. The two kinds of border concepts were closely related and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territory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 words:** cultural border concept geographic boundary concept conflicting blending

### **On the Border Concept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Ming Dynasty——Taking Zhang Huang ( 章潢) 's *TuShuBian*( 《图书编》) as the Main Basis ... An Jiasheng Mu Jun (23)**

*Tushubian* , which is edited by Zhang Huang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y book in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first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he main features of border concept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Ming Dynasty systematically , then goes deeply into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and ascribes the reason of border concepts' formation to the managing experiences of Chinese dynasties , the leading of the monarch in Ming Dynasty ,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geographical cognition to the frontiers.

**Key words:** the intellectuals in Ming Dynasty border concept Zhang Huang's *Tushubian*